

潘富恩 徐余庆

吕祖谦思想初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4.99



吕祖谦思想初探

潘富恩 徐余庆



浙江人民出版社



2 021 2215 8

吕祖谦思想初探

潘富恩 徐余庆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18,000 印数0,001—4,5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103·5

定 价：0.56 元

序

宋明理学作为社会思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主旨是对于汉唐以来经学的反动。北宋庆历熙宁间，以义理之学代替注疏之学，以疑经改经代替疏不破注，一时蔚为风气。学风的变迁，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水份、气候等条件。

宋明理学一出现，便以它自身特有的新面貌改造旧儒学，使得儒学能代替佛、老而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影响和支配着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在理学中有主流派的正统派，如程朱“道学”；有主流派的非正统派，如陆王“心学”；有非主流派，如王安石的“新学”，二苏的“蜀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吕祖谦为理学家，恐无疑问。

南宋时期，吕祖谦及其学派，影响甚大，地位颇高。他曾与朱熹、张栻齐名，号称“东南三贤”。乾道、淳熙以后，他以其独立的学派，而与朱、陆鼎立。全祖望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他既希望通过诸如鹅湖会的形式，使朱陆会归于一，亦企图综合两家，因而，他的思想具有折衷调和的色彩。特别是他提倡致用之学，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而与理学空谈道德

性命不合，与朱陆异，具有自己特点。

吕祖谦是南宋理学各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然而，近三十多年来，不仅无研究吕祖谦思想的专著出版，而且文章也寥寥无几。据我所知，潘富恩同志的新著《吕祖谦思想初探》，要算第一本。该书条分缕析，取材精当，实在难得。而其以理服人，朴实谦虚，如见其人。这与那些以一孔之谬见而视他人为草芥者，以己为绝对真理而斥他人为错误者，实无共同之处。端正学风，实事求是地健康地展开学术讨论，是促使中国哲学史科学化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潘富恩同志是我之师兄，我们曾一度共同就读于温州九山湖畔的瓯海中学，至今仍印下难忘的回忆。他要我为其大著作序，以我之水平、学历实不敢当。但盛意难却，强为之而已。至于该书的价值，社会与历史自然会给以公正的评价，不是一二人所能论定的。

张立文

1983年8月23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一处六排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吕祖谦的生平和学术活动	(1)
第二章 吕祖谦的社会政治思想	(14)
第一节 “取民有制”的赋税论	(15)
第二节 “均田”与“寓兵于农”的托古改制思想	(22)
第三节 尊君尚贤论	(27)
第四节 直谏与顺谏	(33)
第五节 法与德并举的吏治思想	(39)
第六节 “富恤贫”说和“辨上下”论	(47)
第七节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抗金思想	(52)
第三章 吕祖谦的哲学思想	(61)
第一节 “杂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63)
一 “循其天理，自然无妄”的天理观	(64)
二 “以心御气”的心学	(69)
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74)
一 “天下事必有对”	(74)
二 “日新”乃“天地之道”	(79)
第三节 “存心”、“力行”、“致知”的认识论	(83)
第四章 吕祖谦的伦理学说	(92)
第一节 性本善的人性论和“守初心”的修养论	(92)
第二节 理欲义利观	(98)

第三节 忠孝观和仁礼说	(106)
一 “孝者, 仁之本也”	(107)
二 “忠而无谄” 论	(111)
三 “仁与礼” “该括天下之理”	(116)
第五章 吕祖谦的教育思想	(121)
第一节 明理、治心的教育目的	(122)
第二节 “育实材而求实用” 的培养目标	(132)
第三节 求同存异的治学态度	(137)
第四节 教学和读书的方法	(142)
一 “看书须存长久心”	(142)
二 不“讳过自足”	(143)
三 勇于存疑	(145)
四 “知其所以然”	(146)
第六章 吕祖谦的历史观	(148)
第一节 “当如身在其中” 的看史之法	(148)
第二节 “合群策、集事功” 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153)
第三节 “有因有革” 的历史发展观	(156)
后记	(161)

第一章 吕祖谦的生平和学术活动

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①，浙江婺州（今金华）人，生于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七年（1137年），卒于南宋孝宗赵昚淳熙八年（1181年），年四十四岁。吕祖谦祖上为赵宋政权的世臣，有“累朝辅相”之称。自宋开国以来，历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希哲等任宰相之职，封侯受爵。

“其先河东人，后徙寿春，六世祖申国公公著自寿春徙开封，至曾祖东莱郡侯好问，始居婺州。”（王崇炳：《吕东莱先生本传》）吕氏家族从山西迁徙至安徽，又从安徽迁居北宋时的京城河南开封，逐渐成为显赫的官宦世家。由于金统治者进攻中原，1126年8月开封陷落，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父子被虏。建炎南渡，高宗赵构继位，建都临安，过着半壁江山的小朝廷生活。吕祖谦曾祖东莱郡侯吕好问携全家也随之南渡，迁居浙江金华，定居下来。吕祖谦的祖父吕颐中任右朝请郎，伯祖吕本中为中书舍人，父亲吕大器为右朝散郎，而他本人亦曾“以祖恩补将仕郎”（《吕东莱先生本传》），但未正式袭职。他后来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宦海的。根据吕祖谦祖先历任大官的

^①伯祖吕本中为中书舍人，“少从游定夫酢、杨龟山时，尹和靖惇，人称为大东莱先生。”故有称吕祖谦为小东莱之说。

史实来推断，吕氏家族迁居婺州以后，虽然家道已经逐渐衰落，不如南渡前那样的兴盛，但毕竟还属于官僚地主阶层，在当地无疑还是著姓望族。

吕祖谦只活到中年。在隆兴元年（1163年）以前，他主要从事于问学、寻师访友、参加科举考试，为早日登上宦途而努力；隆兴元年以后，即进士及第直至病死约十八年的时间内，他的主要活动则是讲学、著述及参与政事。吕祖谦曾经对自己的一生作过如下的概括：

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湮废于隐忧。（《吕东莱文集·除馆职谢政府启》。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吕祖谦从小就受“中原文献之传”，这是他的家学渊源所致。据《宋史·儒林传》载：“祖谦之学本之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吕祖谦家学渊源相当深厚。他的祖上自吕公著起，被“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公著是北宋旧党的中坚人物。他强调讲学当“以治心养性为本”（同上），很赏识周敦颐、程颢兄弟等人的学识，引为同调。程颢是经他的保荐被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的，后来吕公著又和司马光共同向哲宗皇帝推荐程颢，他在荐表上说：“（程颢）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士”，多有溢美之辞。吕公著本人也受到二程、邵康节等人的推崇。二程赞道：“晦叔（公著）谨严”（《二程文集·遗书第六》）。邵雍则认为“晦叔之言简当……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壤集》卷十九）。这说明吕公著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和二程等理学家相当接近。吕公著的长子吕希哲更是北宋道学中的重要人物，有“道学为世宗”之说。曾因元祐

党人的缘故被排斥于京师之外，“例不得至京师”。他和程颐的大弟子杨时经常在一起讲学，甚至“连日夜不厌”（《家传》），不过，他不象杨时那样严守师说，而是“不私一说”，“不名一师”，在学问上“泛观广接”，“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程颢、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宋元学案·莱阳学案》）从这一史料看，吕希哲问学甚广，虽然以程氏之道学为主旨，但受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未醇之害”。吕希哲开始形成的这一“家风”一直影响着吕氏家族的治学趋向。吕氏家族南渡以后，继承保持了这种“家风”，而尤以“中原文献之学”为盛，一门之中认真研究历史文献而代代相继。吕祖谦的曾祖就是“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的人。伯祖吕本中也是读书广博的饱学之士。他曾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讲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自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吕东莱文集》卷九）这种以儒为本兼通诸家的主张，显然是吕希哲以来的路子。吕祖谦一生治学的风格深受此“家风”的影响。

吕祖谦少时，随父去福州任所，从学于三山的林子奇，后来又问学于临安的汪应辰、胡宪。林子奇是吕祖谦祖父的学生，又与吕祖谦之父吕大器友善，吕祖谦奉父命从学于他。林子奇的著作有《拙斋记问》，其中说到：“《论语》一部，圣人心体，在是须是不释手看始得。”又说：“学者须是疑其悔，于道亏有所入。”吕祖谦对此颇有发挥。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吕祖谦比之其师林子奇“则有出蓝之誉”（《宋元学案·紫

微学案》)。胡宪号籍溪，在学术界影响要比林子奇大得多，他平生好佛、老，为人平和。“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附录》）。吕祖谦受胡宪影响，对佛学也有所汲取，只是他一般不在语言文字间表现出来。胡宪性格上的宽厚作风也给他以较深的影响，反映到他的学术上就是能“平心易气”地对待各学派的“学之所长”，因此为当时学人所称许。朱熹称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欣赏他“约偏持平”的学风。清人全祖望概括他的这种性格特点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俗，宰相量也。”（《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汪应辰，江西信州人。“先生于学，博综百家，粹然为淳儒”（《宋元学案·玉山学案》），因反对和议，被秦桧贬滴建州，“盖以讲学为事”。吕祖谦在学术上的“博杂”的特点不仅受其“博而杂”的家风影响所致，而且可能与汪应辰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汪应辰对待金兵入侵问题的态度，也对吕祖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吕祖谦私人生活颇为坎坷。首先是婚姻问题上“三娶皆先卒”，在精神上受到的刺激不小。他二十岁（1157年）时，娶尚书左司郎中韩元吉的长女韩复为妻，婚后五年韩复便死去。过了七年，当他三十二岁时，韩元吉又将幼女韩螺嫁他，但两年以后韩螺又死了。此后因遭父忧，三年内不能婚娶，故四十一岁时才再娶国子祭酒芮烨之女，芮女时年方十七，但婚后一年又死去。吕祖谦对此十分悲痛，认为其女早卒是因为照料自己劳累过度所致。其次，对吕祖谦精神打击颇为沉重的是他在两次出仕期间，先是母亡，后是父丧。三十岁那一年，吕母曾氏丧亡，吕祖谦离任护丧至金华，守墓在武义明招山之侧。在此期间，附近学者皆慕名前来问学。但是吕祖谦并没有因此忘

怀政事。1167年，他写信给汪端明说：“身任天下之重，先后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谅，避世俗人之嫌”（《丁亥九月十四日与汪端明》）。八年以后，吕祖谦三十八岁，正在当礼部试官，为院试主持人之一。突然接到父丧家报，于是，他弃官奔丧。这次对他的精神打击十分沉重。他悔自己为官事拘縻，没有在父病期间亲奉药饵，特别是父亲弥留之际，自己也不能够送终。他在给朱熹的信中透露了悔恨自责之情：“一官拘縻，疾不奉药饵，没不闻理命，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与朱元晦》）过度的悲痛，加重了他潜伏着的疾病，据称“右支风痹，久成废疾”，“病疾沉痛已成废人”。所以他说“自罗忧患，屏居五年，阖户温习故书”（《与艇斋曾先生》）。

吕祖谦的仕途较为平坦，这与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取随和不争、息事宁人的态度分不开。吕祖谦崇奉理学所宣扬的主敬学说，对《壶范》这本讲究处世哲学的专书极为推崇，曾说：“大抵《壶范》一书，须常置几案，时时观省，所补不小也。”（《与学者及诸弟》）企图从中领悟处世之道，以便能在官场与社会的险恶风浪中立足。在与亲友的书信中他曾说：“某到官垂两月矣，其初殊有齟齬处，近日稍稍安绪，大抵坐谈常觉从容，……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须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长所命，非甚害义，皆当曲从，然先须委曲几谏，必不得已，然后斟酌曲从也。上官招饭，则不可拘旬假要之，但守非旬假不作会，则与世俗稍通也。”（《与戴在伯》）要求自己与友人注意社交应酬，尽量圆通，对上官“皆当曲从”，不要与之发生矛盾。他在《与潘叔度》的信中还谈到自己居官为吏的态度：“天宇间何所不有？无为强自苦也，某自入夏来，每至日落，乃出馆，终日潇然事外，不异山林……大抵不问在朝在野，职分之内，不可惰媮，职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

用省力也。”即所谓“内不敢旷职，外不敢立异”（《答潘叔度》）。他告诫相知友好及其门徒们对于朝中之事不要妄加评论，免得去得罪人。“大凡不在朝廷而论朝廷事，止可泛论大体，不当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止可泛论，不可指名，对州县官言亦然。”（《史说》）吕祖谦的这一与世无争，甚至带点圆滑世故的处世之道，与永康学派的陈亮激昂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也正由于此，使他得以在官场上没有多大的起落，所做的也都是一般的史官和学官。应该说明，吕祖谦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而是思想比较敏锐的思想家和治学严谨的学者。他除了著书立说，积极为封建统治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和进行有补于世教的讲学外，参加政治活动很少。

吕祖谦是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的，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乾道五年（1169年）除太学博士，派遣严州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大力整顿书院，制订了一套学规，并多次对学规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他规定学生不能拉私人关系，所谓“毋得干谒、投献、请托”，师生之间要讲礼节，不忘旧谊，“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同学之间不得“相互品题”，彼此吹捧。其后，又增订学规条例，主张淘汰那些懒惰和学业荒疏者。还补充了道德方面的条例：“不修士检，不齿者，同志共槟之”；“亲在别居，侵扰公私，游荡不检，并除籍。仍关报诸在籍人。”（《乾道四、五、六年学规》）

吕祖谦在出任太学博士期间，与当时的著名学者们有着广泛的来往，“始予官太学，日从四方之士游。”四方士人从学甚众，“士人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永嘉王君墓志铭》）吕祖谦是一个不擅长词令的人，“某天资涩讷，交际酬酢，心所言口或不能发明。”（《祭

张荆州文》)朱熹也曾说过:“近世所见会说话,说得响,令人感动者无如陆子静,可惜如伯恭(祖谦)都不会说话,更不可晓,只通寒暄也听不得,自是他声音难晓,子约(祖俭)尤甚。”(《朱子语类》卷九十六)但是,由于他在学术上气量较大,待人诚恳,而且又善于听取各学派的意见,因此,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皆乐意与之交往。诸如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君举)、薛士龙(季宣)、徐元德等就常到吕祖谦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讨论学术问题。陈同甫(亮)、叶正则(适)也与他常来常往,彼此之间书信频繁。对这些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的评价甚高。例如,吕祖谦说薛士龙“胸中坦易无机械,勇于为善,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与朱元晦》)说陈君举“最长处是一切放下,如初学人正未易量。”(《与潘叔度》)评论徐元德说:“徐居厚极有立作,士人中殊难得。”(《与陈同甫》)他对陈亮的《酌古论》更是赞不绝口:“盖得太史公章法……尤有补于世教。”吕祖谦和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及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张南轩(栻)的关系更为密切。吕、朱两人多次结伴而游,在学术问题上讨论更多。吕祖谦在严州当学官时,和张栻相互推崇,过从甚密。

“张丈邻墙,日夕相过讲论。”(《与朱元晦》)从吕祖谦与许多学者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家学派思想的端倪。正如《本传》所说:“故观先生诸书,而朱文公之学可知,张宣公之学可知,陈龙川、陈君举之学皆有可得而知者。”因此,吕祖谦的学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特点。

乾道六年(1170年),吕祖谦撰《上孝宗皇帝轮对札子二首》,主要内容是要孝宗恢明“圣学”,“亲贤远佞”,对“恢复大事”即北上抗金收复国土,要有通盘的精细而又长远

的打算。在此期间，吕祖谦为人代书奏表比较多。从这些奏表中也透露了他本人的政治态度。如在《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中，他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弊政，陈述了“丁盐钱绢为民大害”的原因，流露了对劳动群众的同情。

乾道八年（1172年），吕祖谦任礼部试官，选拔陆九渊。其经过有如下的记载：“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先生（陆九渊）《易》卷至‘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洗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又读‘天地之性人为贵论……’，愈加叹赏”，于是认为“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静之文。此人断不可失。”（《象山全集·年谱》）其实，吕祖谦对陆九渊的文章早就读过不少，而且十分赞赏。“公（祖谦）平日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比试礼部，得一卷，曰此江西小陆之文也。”（《吕东莱先生本传》）吕祖谦在陆九渊中礼部试后，一遇见他便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朗，知为江西陆子静文也。”（同上）

乾道九年（1173年），吕祖谦在服丧期间，而问学诸生又重新集合。这一年，刘子澄、陆子寿都和吕祖谦彼此问学。

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居明招山旁守墓至5月，6月陆九渊亦自杭州来到东阳，这时吕祖谦刚刚除服，复官位主管台州崇道观，与陆九渊相聚五六日。

是年8月28日至9月中旬，吕祖谦与潘叔度从金华出发，“为会稽之游”。沿途或坐船或步行，经过许多乡村和县镇，遍游名山古寺以及晋王羲之的兰亭和故宅等等。他曾就此行专门用日记的形式写了一篇游记——《入越记》。文笔生动，叙述逼真，读来如临其境，可惜这篇游记尚存的只写到9月14日，后面部分已残缺丢失。

入越之游后，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即南宋理学阵营内部的“理学”派和“心学”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使之哲学观点“会归于一”，积极出面组织召开一次朱、陆双方的学术讨论会。吕祖谦在这年年底曾约朱熹于次年的春天到金华相会，并准备会后游览天台山和雁荡山，但是朱熹因故不能前来。因此，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从浙江东阳出发，到福建崇安朱熹的“寒泉精舍”留住了十多天。吕祖谦给邢邦用的信中曾说：“某自春来，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在给陈亮的信中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相聚切磋。”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也提到，“淳熙己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上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由此看，吕祖谦在福建建瓯一带逗留了约两个月，与朱熹相聚四十多天，而被朱熹留在家中十多天，相与研读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的书。两人都认为周、二程、张等人的书“广大宏博，若无津涯”，使人难以一下子掌握。为能使人“摄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吕祖谦与朱熹共同摘编而成了《近思录》，以作为初学者学习道学的入门教材，书后有吕祖谦写的跋。

当吕祖谦结束了福建建宁之行，朱熹特地亲自送他回浙江，途经江西上饶鹅湖时，便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会，这也是吕祖谦事先安排好的。这次鹅湖之会，规模不算很小，虽然在这次会上直接参与辩论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如浙江的学者刘子澄、赵景昭、赵景明、潘叔度，还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的若干门人。鹅湖寺处闽、浙、赣交界，有关学者闻风而来，估计不会少于二十来人。

据《象山年谱》引朱亨道的一段评论说：“鹅湖讲道，诚当令盛事。伯恭盖虑朱、陆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又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关于“鹅湖之会”的具体情况，朱、陆门人皆有记载。从《象山年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这次鹅湖辩论会上，双方都意气用事，互相攻讦。似乎陆氏兄弟攻势更猛一些，占了上风，朱熹“大不怿”，结果不欢而散。而吕祖谦则不失会议主持者应有的风度。“甚有虚心相听之意。”对辩论的双方做了不少工作。在会上，吕祖谦没有明确表态，但从陆九渊埋怨吕祖谦为“元晦所尼”一语来看，似乎有点偏向朱熹。不过二陆并没有因此和他产生齟齬，相反对他是十分赞许的。陆九渊在吕祖谦的祭文中说：“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对朱、陆两人的评价分别是“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与陈同甫》）。

淳熙三年（1176年），吕祖谦又与朱熹相会于浙江衢州。是年，由于礼部侍郎李涛的推荐，他被除予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淳熙四年（1177年），吕祖谦重修《徽宗实录》。书成呈送孝宗，并面呈奏表。他重修《徽宗实录》是为了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希望南宋小朝廷“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免蹈复辙，并提出了部分改革的主张。接着，他被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

淳熙五年（1178年），吕祖谦完成了奉诏编修的《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而